

提灯的人

□子安



晨起推开窗户的时候，薄雾还在老槐的枝丫上挂着，手机轻轻一震，一条消息就蹦出来：“老师，记者节快乐！”发件人是西北某个城市的号码，备注栏里标注着几年前采访过的那个人——戈壁滩上种胡杨的退伍兵。

这样的问候，从北国的霜浓露重，到江南的烟雨迷蒙，每每会在这个日子如期而至。每年11月8日，那些散落在岁月里的名字，都会乘着电波回来。

最难忘的是草原上的其其格。那年冬天大雪封路，我们被困在毡房里三天，她往炉膛里添着干牛粪，橘色的火苗舔着铜壶，她给我讲草原上即将失传的驯鹿歌谣。稿子见刊后，她第一次看到了经她讲述的故事，在电话那头哭了。现在她每年都会寄来奶豆腐，附言永远只有一句：“记者老师，草原想您。”

还有大山里的孩子，去年记者节，我收到一个褪色的布包，里面是十二双绣着名字的鞋垫。最大的一双绣着“春燕”，她是我在大山里采访的第一个留守儿童，现在已经是县中学老师了，在信上她写：“您当年说，大山的孩子也要看见光，我现在正带着孩子们看光。”

这些细小的联系像看不见的丝线，把我跟远方纠缠在一起，朋友们打趣说这是当记者留下的“后遗症”，也许真是这样，你要是真把自己埋进泥土里，听见大地的心跳声，那声音就会长在你的血脉里。

想起刚入行那阵子，老师带我去看一场大洪水，浑浊的积水齐腰深，他把摄像机举得老高，让我把笔记本顶在头上。回到驻地，我们守着机器等稿子传回来，他用冻僵的手泡了两碗方便面，热气蒙住了眼镜，“记住了，记者不是历史的旁观者，是时间的记录者。”

后来我踏过边远的山区，也穿过灯火通明的城市，在泥泞里受过伤，在领奖台上见过盛世，但是最贵重的东西还是一群人掏心掏肺塞给你的那一份情分，把他们的伤口、希望、骄傲还有软肋都放在你笔尖上。

小林是我带过的最后一个实习生，去年据说去国外了，在一个疟疾横行的城镇当驻地记者。今早发来的照片里，他抱着当地孩子笑容腼腆，他说：“哥，你告诉过我，记者是提着灯走路的人。”

是的，提灯的人，这盏灯在我手里亮了十五年，现在传到了更多的年轻人手上。窗外的老槐树正在掉叶子，金黄的叶子旋着，压住去年这个时候落下的叶子，地底的根，还在黑暗里慢慢长。

如同那些再也见不到的日子，其实并没有走远——它们只是变成了地下的河，直到某一个清晨，就突然涌出了清泉。记者节这天收到的祝福，让我明白有些时候，离开只是换个方式继续坚持，而我们写过的人心早已是我们的土壤。

阳光终于穿过槐树枝，在书桌上留下斑驳，我慢慢回复每条信息，指尖碰到的，是依然滚烫的岁月。

流年碎影

父亲的书香

□马七斤

我虽生于农家，却始终浸润在书香里，这份底蕴，全源于我的父亲。

父亲是爷爷奶奶的独子，自幼聪慧。旧时读四书五经，15岁那年，教书先生已觉教他吃力，先生离开后，父亲竟接过教鞭，昔日同窗成了他的学生。从此，他游走于周边村落执教，桃李满乡，胸中也积下了满肚诗文。新中国成立后，因祖父年事已高，父亲便辞去教席，回乡务农。

父亲多才多艺。他不仅文章写得极好，而且毛笔字娟秀遒劲，画技更是传神，能把牡丹画得娇艳欲滴，离鸟画得活灵活现。他口才也好，大会上讲话引经据典，乡亲们听得入迷；闲时在田埂、饭场里讲古说今，总能引来一圈人津津有味地听他讲故事。他还写过剧本，被当地剧团搬上戏台。因算盘打得精，他还兼任了全大队五千多人的信贷员，把账目算得分毫不差。

或许是受父亲熏陶，哥哥自小就爱动笔。12岁起在渑池广播站，渑池当地报刊发表文章，初中毕业后参军，又常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刊发长文，后来入党，成了军官。转业到洛阳后，他发表的文章集结成了20多册剪贴本。

受父亲和哥哥影响，我也踏上了新闻写作之路。三十多年来，在中央及省、市媒体发表新闻、文艺作品七千余篇。2017年从新闻岗位退休后，我仍没放下笔。闲暇时，我会摆弄近十种民族乐器，在文艺圈里凑个热闹。

我和哥哥能从贫穷的山村走出来，并为社会作出一点积极贡献，都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与鞭策。至今想起他，我心中仍是满满的崇敬。父亲为人正直和善，尽管我调皮顽劣，但他从没有打过我一下。村里邻里间有纠纷，谁家夫妻不和，大伙都爱找他调解，他说的话大家都信服，所以，他在村里威望很高。可他身子瘦弱，看上去弱不禁风的样子。

1982年的端午节，父亲走了。我守在床前，眼睁睁看着他闭上了眼，他眼角那滴泪，成了我一辈子的痛——他大概是放不下我这个还没成家的小儿子。父亲的离去，像我身后的大山突然塌了，满心都是痛苦和无助。我总自责，当初没能救他；也总后悔，他在世时我不懂事，偶尔还惹他生气……

父亲走了四十多年，我从未辜负他的期望。这些年，我用对党、对人民的忠诚与热爱，默默报答着他的养育和教诲——这是我能给父亲的最好的告慰。



题字：邵玉铮

好看故事

悬崖上的转弯镜

□张申东

老刘看见儿子小刘把参加竞标的材料塞进文件袋里，便说这个项目很重要，咱们要竭尽全力争取中标。小刘点头说是，转身往外走。老刘说：“我和你一起去。”

老刘觉得小刘大学毕业后，在公司磨炼了三年多，样样也算能拿得起来了，就把公司交给小刘管理，不再过问公司的事了。可是眼下，这个项目资金数额大，工程难度大。老刘便想利用这个项目再带一带小刘。老刘想，如果把这个项目竞标到手，再顺利完成这个工程，他就可以彻底休息了。

小刘驾驶着汽车，沿着弯曲的山路奔跑着。在一个急转弯前，小刘按喇叭，“滴滴滴——”突然，老刘喊：“停停停。”

“咋了，爸？”

“转弯镜。”

路边，固定在钢管上的转弯镜歪着头，像个犯了错的孩子耷拉着脑袋站在那里。转弯镜扭向一边，汽车通过转弯处根本无法看到对面情况。

此时，乌云翻滚，猛烈的山风吹得转弯镜摆动着“脑袋”，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

“我去扶正转弯镜。”老刘说。

“到护栏外扶正转弯镜？”小刘满脸疑问。

“对。”老刘很坚定地说。

“爸，这个事就别管了，别误咱们竞标的事。”小刘看看手表。

“转弯镜是司机的第三只眼睛，你看这个样子，多危险！”老刘说。

“或许不会出啥事吧？”小刘说。

“这可不是或许或也许的事，万一出事，汽车就会从悬崖上跌下去。”老刘说罢下车奔向悬崖边上的转弯镜。小刘抱腕又看了看表，大声说：“爸，我们回

来时再弄吧？”

老刘摆摆手，很坚决地向转弯镜走去。一道闪电过后，风更猛烈了，裹着沙土的雨点砸在老刘脸上，他全然不顾，伸手把歪向一边的镜面一点一点扭转，摆正。刚松手，转弯镜像有意跟老刘作对，又耷拉下脑袋。老刘仔细查看，发现转弯镜损坏得很严重，根本无法扶正了。

离竞标时间越来越近，小刘心里万分焦急。老刘让小刘找来活扳手，又让小刘把住转弯镜，拿出曾在工厂当钳工的本事，“咔嚓咔嚓”使劲拧已经锈住的螺丝。老刘不时地抹一把脸上的雨水和沙尘，问小刘：“正不正？”“正了，非常正。”小刘没有正眼看转弯镜，而是在看手表。

这时，一辆汽车开过来，车窗落下来，司机伸出头，看看风中的老刘，又看看老刘身后的悬崖，喊：“维修工师傅，谢谢啦，注意安全啊！”

“师傅？”老刘心里想，这是把他当成维修转弯镜的师傅了。

小刘冲那位司机说：“我们不是维修转弯镜的师傅，我们是去竞标的，这都要来不及了。”小刘这话意在提醒老刘。

老刘向那位司机友善地摆摆手，继续修转弯镜。司机冲老刘竖起大拇指。

此时，过往车辆的司机都打开车窗，迎着大风在悬崖边修转弯镜的老刘投来敬佩的目光，有的还拿出手机，录制下老刘维修的过程。

老刘让小刘一会儿找螺丝，一会儿找工具，费了一番周折，终于修好转弯镜。转弯镜在大风中昂起头，守护着过往汽车司机的安全。

老刘和小刘赶到竞标地点，已经失去竞标的资格。

你的名字，是自己的光

□刘晓

她却：“写永军妈。”永军是我老公的哥哥，家里的长子。我没有再说什么，心里却泛起小小的涟漪。我完全没有苛责婆婆的想法，毕竟她是旧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人，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是时代留下的印记，不是别人一两句话就能改变的。

回想起十多年前，我住在家属院，刚生了儿子都都。院里还有一个宝宝，叫当当。每每提起当当的妈妈，我和家人都习惯称“当当妈”。后来当当妈妈告诉我，她提起我都叫我的名字。我知道她叫娟娟，可是“娟娟”总不如“当当妈”好叫。说“娟娟”有人可能一时反应不过来，但说“当当妈”，大家一下就知道是谁。当年，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来细想，有些称呼是因为传统习俗，有时可能只是由于懒、图方便。可这懒和方便是否也杂揉着刻入骨髓融进血液的习俗和我们名字的认识呢？

如今，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女性的地位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在身份证、银行卡、工作证件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再也不用依附于他人的姓氏或身份；我们可以在社交场合自信地介绍“我是某某”，而不是“我是某某的妈妈”；我们更不会轻易忘记自己的名字，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个名字承载着我们的过往、当下与未来。

家庭聚会中，长辈介绍女性亲属，总爱说“这是某某的媳妇”“这是某某的妈妈”，可介绍男性亲属时，往往会直接说出他们的名字，这种细微的差异，其实都在无形中弱化着女性的个体身份。

那么，我们该如何打破这些看不见的枷锁呢？我

想，答案或许就藏在“努力”两个字里——努力工作，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光发热，让别人记住的不只是“某个岗位上的女性”，更是“名叫某某的优秀从业者”；努力生活，认真对待自己的喜好与追求，不管是学一门新技能，还是去看一场期待已久的展览，都在告诉自己“我值得被好好对待”；更重要的是，努力做自己，不被“妻子”“母亲”的标签束缚，敢于在别人叫错自己身份时，笑着纠正“我叫某某”，敢于在家庭与自我之间找到平衡，不因为承担家庭责任就放弃自己的梦想。

而且打破枷锁从来都不是女性一个人的事。当家人在介绍女性时，能主动说出她的名字而非仅仅是身份；当同事在相处中，能多一份对女性个体的关注，记住她的全名与特质；当社会在规则与习俗制定中，能充分考虑女性的需求，给她们更多展现自我的空间，那些无形的枷锁才会慢慢松动、瓦解。如果我再陪婆婆出门，遇到需要登记名字的场合，我会笑着跟她说：“妈，写上你的名字——孙仙花。”

其实仔细想想，“念出自己的名字”只是女性觉醒的起点，而非终点。因为在名字之外，还有更完整、更丰富的“她”，就像王碧奎在说出自己名字后的那份感慨。我想，藏在名字背后的故事、喜好与才华，才是每个女性最珍贵的部分，才是“自我”真正的模样。

当代一代又一代的女性，都能清晰地记得自己的名字，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坦然地做真实的自己时，那些曾经束缚着女性的枷锁，终会在时光的流转里，在无数个“她”的努力中，慢慢消散。而每个女性的名字，都会像一束小小的光，照亮自己的人生，也温暖着这个世界。

笑起来，世界就暖了

□石闻

委。那是一场严肃的公开招聘，几十个年轻人依次入场，气氛紧张得几乎能听见人的心跳。就在这一片紧绷中，一位考生推门进来，眉眼弯弯，笑容明净，应答从容得体。那一抹笑，不只是礼貌，更像一缕清风，瞬间吹散了场内的滞重。

后来，她果然以高分被录用。我心想，这不只是专业素养的胜利，也是那一笑的能量。

微笑，是人与人之间最近的路，不只对陌生人有用，对熟人更是暖流。它是一张无声却灿烂的名片，能破冰，也能融心。

微笑，也是治愈生活的万能药。愁眉苦脸解决不了问题，但微笑可以——一笑解千愁。笑出来，心不累；笑出来，路好走。

这些年，我越来越体会到微笑那生动而独特的价值。无论是参观交流，还是洽谈合作，一个真诚的微笑，都是最好的“开场白”。它不费一分一厘，却能瞬间拉近距离，让接下来的对话如水般流淌。

这让我想起大学时读到的那个故事——关于一个微笑，如何救了一条命。

20世纪30年代，有个犹太传教士住在一个德国乡村。他每天清晨都会去小路上散步，遇见任何人，都会微笑地道一声：“早安。”

年复一年，直到纳粹上台。悲剧终究降临，他和全村的犹太人被押上火车，送往集中营。月台上，一名指挥官手执指挥棒，面无表情地指向左右——“左”意味着死亡，“右”意味着暂可存活。

队伍缓缓前移，终于轮到他们。他颤抖着走上前，抬起头——就在那一瞬，目光与指挥官相遇。



几乎是出于本能，他轻声说：“早安，先生。”

指挥官脸上没有表情，但嘴唇微动，回了一句低得几乎听不见的：“早安。”

随后，指挥棒向右一指。他活了下来。

人，其实是极易被感动的生物。有时并不需要千金馈赠、万般付出，只是一个真诚的微笑、一句温暖的问候，就足以在另一个人心里点亮一整片天空。

别小看一个微笑，它可能是你不用花钱的最好礼物，也是一种顶级的修养。它或许能让陌生人为你驻足，或许能在关键时刻为你引路，甚至成为打开你人生转折之门的那把钥匙。

微笑可以表达谢意，也能传递期待，它有一股温柔而坚定的力量。孩子的笑叫天真，老人的笑叫慈祥，而你的笑，就是你心地的模样。爱笑的人，运气总不会太差。爱笑的人，人缘也好。

日子那么长，何必总挂着一张“苦瓜脸”？它不应该是勉强挤出来的假笑，而是从心里溢出来的光。你真诚与否，别人都感受得到。那么，从今天起，做一个“会笑”的人吧。